

6

12103
R59

天下论丛

文明的表现

——对 5000 年人类文明的评估

阮 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表现/阮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301-05227-8

I. 文… II. 阮… III. 世界史:文化史-研究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318 号

书 名: 文明的表现

著作责任者: 阮 炜 著

责任编辑: 符 丹 赵 艳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227-8/K·030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7

排 印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2.75 印张 36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宋〕张载

致 谢

本书的研究工作、资料收集和写作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和深圳大学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先生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符丹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感谢。

在本书主题酝酿和写作过程中,笔者先后同深圳大学的景海峰、深圳行政学院的蒋庆、南京大学的袁世安、中山大学的林岗、陈少明、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兆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天纲,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进行了十分有益的讨论。正是在与诸学友的切磋中,本书的思路才得以最终形成,在此谨表感谢。

山东潍坊师范学院的张少文女士为本书做了重要的资料搜集工作,在此谨表感谢。

阮 炜

2001年6月20日

《天下论丛》编委会名单

主编：盛 洪

委员：（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陈	明	蒋	庆	何怀宏	何光沪
黄	平	黎	明	刘军宁	刘小枫
盛	洪	杨	鹏	杨 平	汪丁丁
汪	晖	王	焱	吴国盛	张宇燕

《天下论丛》策划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天下论丛》总序

中国文人有谈论“天下”的传统。但近一百多年以来，他们谈论得少了。他们关注的，不是“天下”，而是“国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关心的“天下”，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而近代以来其他文明的挑战使他们发现了“天外有天”；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优哉游哉谈论天下的前提，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近代以来，这个屏障被打破了，他们都忙着“救亡”，哪有工夫谈论天下。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等强国，但她至少没有灭亡之忧。这使中国的文人，有一些空闲看一看天下了。而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这不仅指实力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由于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聚合成一个经济巨人。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有天下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中国人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关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要涉及到对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

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最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开通,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太大了。因为大,就更接近于天下。正如奥尔森所说,一个局部的群体所覆盖的范围越大,它的利益也就越接近整体的利益。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最大,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天下的事情。

而这个天下并不太平,也不完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说明,那种通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规则,还在隐蔽地支配着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相继崩溃暗示,产生于市场的新的金融技术,又有可能成为摧毁市场制度乃至全球经济的垄断力量;民族、国家、宗教间的对立,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则告诉我们,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并不必然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坐在全球网络终端后面的,是互不理解的心。

很自然,我们希望天下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作出努力,使这个天下更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我们的愿望符合所有其他人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才是“天下的”。因此,我们对天下的关注,不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谋略,也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而应是一种博大的、宽容的爱。与此相应,如果中国能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的话,最有可能的是通过文化的影响。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以至军事影响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如果能有所影响的话,对于接受文化影响的人来说,一定是一种福利的增进。所以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

应当承认,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还是刚刚开始。甚至在五

年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要谈论“天下”。这种变化和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变化有关。但是与我们的心理准备相比,这一变化来得相当突然,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资格直接进入主题,就像一个在物质上突然变富的人,心灵还没有丰富起来一样。我们不得不在讨论天下问题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别人,一是认识自己。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眼睛向外,但也许是由于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过于急切,他们对外国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以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即使他们注视的西方,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是被看做希腊传统的现代变型,而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另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文化源泉,希伯来传统。由于总是和西方较劲,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忽视了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一般来说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也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甚至不亚于某些西方人。

在另一方面,向外关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一个经济上崛起的民族要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的话,一个民族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越大,它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尽管在传统上,中国有“慎大”之说,但在今天,这种传统似乎已经失落了。很少有人去检讨,中国人的道德的提升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而实际上,中国在道德上的灾难,决不亚于那些有形的、如长江洪水带来的灾难。中国既没有从她的传统中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成功地移植外国的文明,因此人们会担心,中国人是否能驾驭那突然涌流的巨大财富。而这恰恰是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责任的分子所要努力改变的,即在充分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分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尽自己的努力,催发和培育中国新的文明。

为了上面讲的种种目的,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天下论丛》*。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纵论天下的地方。天下之大,海阔天空。我们可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民族、国家、宗教。我们同时也很希望,就天下问题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即讨论其他文明究竟如何,以及中国的文化资源究竟如何。既然讨论天下,就要有胸怀。本《论丛》惟一的规则就是宽容;惟一不能宽容的就是破坏规则。我们期盼着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进行对话,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沟通,我们尊重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由于天下的问题过于复杂,本《论丛》也许给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辟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场所,我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如果文明间的融合与整合不可避免,就必须借助于文化间的互动;如果一个全球文明的形成是解决天下问题的惟一方案,它也只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虽然我们决不低估理性的力量,但只有把它置于更为强大的自然秩序之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都应转化为对文化互动秩序的尊重。只要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只要我们认真地推进《天下论丛》的编辑和出版,它就会给我们带来超越个人想像力的、积极的文化结果。

盛洪于北京郎家园

1998年8月30日

* 感谢王焱,是他提出了《天下论丛》的名字。

导 言

自黑格尔、斯宾格勒以来,西方研究文明形态尤其是文明互动史的学问可谓蔚为壮观,成果早已汗牛充栋。相比之下,从中国人的角度考察各文明的形态,探究各文明间的互动,进而对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注意:不是“中国的文明”)的表现作出适当评估的著述则不多见。随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迅速增长,有着深厚底蕴的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作用必将大大增强。一切迹象清楚地表明,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文明将扮演一个比现在重要得多的历史角色。这将是一个新的角色,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西方列强加在它头上的角色将有本质的不同,尽管这个新角色的确切内涵仍处在不断呈现之过程中。

对此,中国人是否已有清醒的意识?中国人是否已做好了扮演这新角色的文化心理准备?除了四大发明及“中国也曾领先”一类笼统说法或模糊印象,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优秀表现是否已有了具体、全面、准确、深入的认识?一百多年来,因持续不断的外部侵蚀和内部病痛,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已大受损伤,现在是否已到了既要继续“拿来”,又要固本正气、重振旗鼓的时候?这些问题,已构成了从中国人的视角、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文明研究的充足理由。

但要实现文明角色的历史转换,要迎接新世纪的文化担当,首先要树立起足够的文化自信。要树立起这种自信,就要在深入、具体地认识其他文明中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文明。要树立起这种自信,就不应让自己的心态继续滞留在过去,更不应总是把自己想象

成一个被动挨打的形象,甚或沉湎在某种精神自虐之中。21世纪初的中国毕竟早已不是衰朽的清朝,或刚刚成立的民国,已没有“救亡”抑或“启蒙”问题的纠缠,更毋庸发出“打倒孔家店”、“烧掉一切线装书”的怒号。眼下中国人大可不必像当年那样悲愤填膺、呼天抢地,而完全可以心平气静,对自己的文明乃至所有文明的长处短处、成败得失作一客观的掂量和评估。

风物长宜放眼量。须看到,在五六千年文明史的宏大书卷中,一百年只是一页;在几百万年人类史更宏大的尺度上,一百年只是一刹那。也须看到,在浮士德精神驱使下,西方文明虽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给中国带来了屈辱和伤害,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在北部和西北部虽不断有游牧民族的入侵,在东南部也曾有过倭寇的骚扰,但总的说来,与其他文明在地理上是隔离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虽在中国与其他地区间架起了桥梁,但藉以发生的文明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毕竟有限,至少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如此。除了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明得以大量吸纳印度文化要素,唐代也较多地汲取了“西域”文化要素,总的说来,近代以前中国文明十分缺乏与其他文明进行深层次互动的机会。

这里权且将文明看做有机体。既为机体,就需要不断接受外部刺激,方能保持活力,方能继续成长。如果缺乏足够的外部动因,任何一个文明以其既有的内部动能,都不可能长久保持其活力。中国文明虽然历史悠久、表现极佳(这无疑导致“天朝”心态的根本原因),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前总的说来缺乏有深度的和广泛的外部刺激。这就是中国虽曾辉煌,明代后期以后却愈来愈疲惫、衰弱的根本原因。至1840年西方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它才如梦方醒。正是在此后,中国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终于有了一个与异质文明进行全面、深刻互动的机会。这固然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无可置疑地是一个重大的文明史事态,更无可置疑的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绝好机遇。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既在此,就必须抓住。抓住机遇,就是实现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对西方全面而深刻的挑战作出创造性回应。惟如此,中国文明方有可能在疲遑中振作起来,从衰落中走向复兴。

然而,要进行这种创造性回应,首先有必要以一种中正、平和的心态对主要的人类文明进行一种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在更具体、更全面地认识其他文明的过程中更准确、更深入的认识自己的文明。总是沉溺于一种屈辱挫折所致的恼怒和怨恨中不能自拔,终究不是一种健全、理智的态度。一个文明如果缺乏底气,或者说在根柢上是羸弱的,便必然经不起风浪。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中国文明并非是弱不禁风,而是有着巨大的规模和深厚的能量,是经得住风浪的。暂时的挫折,不可能将其巨大的规模抹去;一时的低落,不可能将其巨大的能量取消。

出于这种考虑,本书对古往今来的文明作了宏观比较或“对勘”,揭示其优势弱点、荣辱兴衰及因果脉络,也尽可能清晰地将中国文明的卓越表现呈现出来,以期还中国人一份本来应有的文化自信,明白中国文明史并非只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新文化运动时期,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短处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必要的。时过境迁,如果当代中国人仍然沉溺在某种自虐性的文化心态中,就不应该了。在新世纪、新条件下重新强调中国文明的优秀表现,或许有助于纠拨这种心态。这样做,并非出于某种文化民族主义心理,也非要在反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思潮中鼓吹一种不健康的中国中心论,更非要全盘否定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缺陷所作的深刻反省。

因为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中国文明决非例外。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迅速摈弃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衙门酷刑、裹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大家庭等等,总归是不合时宜、应当摈弃的。中国人公德薄弱的积习、重道轻器的倾向、形式主义的作风、一轰而上的习气、顽固的官本位心态,都与现代精神相悖,是亟须努力克服的。西方文明同样不是尽善尽美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西方文明更有严重缺陷。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道义的缺失。道义的缺失有诸多表现,最突出之处在于那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也在于那唯我独占真理、一味地分裂而非合和的文明禀性。以下事例或足以说明这点。

15 世纪末以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入侵亚洲和美洲时

对当地人民极尽烧杀掳掠之能事,其后又为争夺赃物而在自己人中间大开杀戒(这与郑和巨大舰队七下西洋时所表现出的和平主义品性相比,何止天壤^[1])。1840年,英国人因中国人禁止其在自己国土上倾销鸦片,发动了一场入室打劫的战争,击败了腐朽的清王朝,逼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不说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分裂为诸多民族国,就连在小小英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分裂也几百年如一日地导致激烈的民族矛盾;在最近半个世纪的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几乎无日不发生流血冲突,尽管在包括北爱尔兰在内的英国,资本主义早已成熟,物质生活早已十分丰富。当然,最突出的例证来自1914年和1939年,四分五裂的西方民族国因权力斗争而发动的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之巨骇人听闻的两次世界大战。^[2]

因而,诚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1958年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言,西方人应当学习中国人“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惻怛或悲悯之情”和“天下一家的情怀”。^[3]简而言之,西方人应当学习中国文明那种和平的秉性和道义的精神。

当然,西方文明决非没有优点。对于这些优点,中国人总归要学习、研究、接受和吸纳的。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其法制精神,以及在法律的规范下使个人意志得到充分表达、个人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种种有效机制。西方人的公德心和敬业精神也明显、普遍地强于中国人。西方人更敢于进取、敢于尝试、敢于冒险、敢于创新。这些品质,都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衡量一个文明是否底蕴深厚,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它是否有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气度。不妨把文明看做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或一个长时段的有机结构。不吐故纳新,不因时因势地变革、更新、创造、发展,便不可能有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

讲文明的优点或缺点,自然是在文化形态和品质的层面上评价文明。这是“文明”一个重要的词义。但“文明”还有另一个意思与之纠缠不清,即禀有特定生命样式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当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时,他显然不是在讲文明在形态意义上甚或物质层面上的冲突。东亚人喜喝的茶、阿拉伯人喜喝的咖啡和拉美人喜喝的可可,是不可能冲突的。亨氏所要讲的,是基于历史文化

同一性的共同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亨氏甚至预言,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文明间会发生“冲突”乃至“文明大战”。这毫不奇怪,是西方人一味分而非合的固有心态使然,更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攻击性使然。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文明间以及无数未发展成文明便夭折了的“原始社会”间有冲突,但更有融合。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无一不是由较小的人类群体长期融合而成的。^[4]不乏象征意味的是,在习俗层面上,东亚人也可能喜欢咖啡,阿拉伯人和西方人也可能喜欢茶,西方人、东亚人或阿拉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也可能同时喜欢这三种饮料。

即便在更具实质性的宗教层面,不同文化要素也并非不可以融合。虽然在大量人口皈依伊斯兰教后,印度文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其很大两块疆土已被分割出去,变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当然,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身上都带有不可磨灭的印度文化成分,印度穆斯林更是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源于不同文明的宗教却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可调适性和可融合性。当一个中国人信奉了多为西方人和拉美信仰的基督教时,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中国人”吗?如果一个印度人恰恰是袄教(或琐罗亚斯德教,在印度亦称帕西教)徒或天主教徒,可以说他其实是伊朗人或西方人,而非是认同印度文明和印度国家的印度人吗?如果汉代以后无数中国人信佛,可以说他们所认同的已是印度文化,因而不是儒家信徒吗?如果一个日本人恰恰信佛,可以说他只崇奉印度文明或中国文明,而不再认同日本文明了吗?甚至当一个中国人或印度人拿到了美国绿卡时,可以肯定他从此不再认同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不再认同中华国家或印度国家吗?

然而,讲文明的融合,特别是文明在器物层面的频繁交流,并非是说一个普世文明已经形成,更不能认为普遍的和平已然降临,人类进入了“千禧年”或某种世界性的“太平盛世”。不能因为全世界都用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因特网,全世界的人类都看好莱坞电影、吃麦当劳快餐,便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文明。这些多属于器物层面的东西也许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的普世文明,但不能因此认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文明。即使真出现了这样

的文明,也不等于被称作“文明”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间将不再有争端或冲突,不等于“文明大战”必然不会爆发。既然两次世界大战均能在一个单一的文明即西方文明内部发动,且主要战场均在欧洲,便没有充分理由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必定不会发生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甚或文明间的世界大战。因此,确保未来人类不发生“文明大战”便是对人类文明的考验,对人类本身的考验。因此,应当把文明关怀上升到人类关怀的高度。这才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讲文明的冲突也好,文明的融合也好,文明间的力量对比毕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相对于其他文明,西方正由先前绝对的支配地位相对迅速地走向衰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势必引起一些西方人的忧虑。譬如亨廷顿就认为,西方正在由权力的中心被挤向权力的边缘。据他统计,西方政治控制下的领土所占世界领土比例由20世纪初的38.7%下降到世纪末的24.2%;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人口所占世界人口份额从20世纪初的44.3%下降到世纪末的13.1%,及至2025年,更可能降至10.1%;西方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64.1%下降到1992年的48.9%。^[5]虽然西方“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但它所仍然享有的这些优势只说明:衰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西方的崛起历时四百年之久,它的衰落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如果将1500年这一方便的年份设为西方崛起的始点,则1900年左右是它权力的峰顶,而谷底更可能至2300年才会最终到来。况且衰落并非呈直线型,而可能很不规则,有诸多间歇和反复。^[6]

看来,文明的兴衰涨落并非简单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可能需要数百年方可完成一个回合或循环(如果这一假说成立的话)。即便不拘泥于十位数和百位数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理由对走下坡路的文明幸灾乐祸,因为假如信奉这种哲学,以为现在轮到你在台上风光了,那么下一个被赶下台的便必然是你自己。因此,近年来流行的“河东河西”说是一种未经深思的轻率之论。况且“西方衰落”的流行说法即便能得到确凿的证实,也至少需要一二百年时

间。也不难发现,亨廷顿在“西方衰落”的描述上,也不无夸大之辞。他在对比各文明在世界军事人员总数中所占的份额时,指出西方1900年占世界总数的43.7%,而1991年则只占21.1%了,却闭口不谈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西方的军事优势(先进武器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战争组织及动员形式)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已大大加强,与其他文明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从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美国对格林纳达、巴拿马等国的军事干预中是不难看出的。考虑到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军队人员数量的重要性已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亨廷顿的夸张就更明显了。^[7]

正是由于西方所享有的暂时优势,文明舞台上出现了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藉着那仍未消失的经济、政治、军事权力,先前打家劫舍的强盗已摇身一变,俨然成为真理在握的圣徒;倍受凌辱后,先前文弱温良的书生闻鸡起舞、练功强身,以期不再被欺侮,可发现筋骨稍变得强健了一点,却已由无辜变为被告,动辄被人目为形象不佳、动机可疑、行为不轨。这既可叹,又可恼,又可笑。这里不是说文明不可以“进步”,变得温润。就连强盗也可以弃恶从良。可是,要一个没有经历过多少坎坷的文明脱胎换骨,谈何容易。也不是说一个文明如果在本质上是温良平和的,就一定是十全十美,不再有可改善之处。可是一个文明如果没有掠夺的根性,而不得不以剥夺自身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8]尤其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其步履便必然是沉重而不稳的。在此过程中,失范和失误在所难免,而解决失范、纠正失误总归是要花气力、花时间的。这里想要说的是,即便有挫折所致的难堪,那源于深邃历史的雍容大度不应被遮蔽;即便有压力所致的尴尬,那敦厚谦和的文明风范不应被忘怀。

以此故,有本书的思考和认识,愿与大家分享,并敬祈批评。

附注:

[1] 见本书第十六章“中国:历史连续性中的文明规模”第七节。

[2] 汤因比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大特点是“本位主义”(Parochialism,亦可译为“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在政治领

域表现为“众多新的地方性主权国家”，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形式是“众多新的地方语文学”，在宗教领域则是各种宗教派别或“运动”“与中世纪统一的西方教会发生剧烈的碰撞”。这里，“本位主义”与西方思维中一味分裂而非合和的倾向其实是一回事。见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12 volumes, Vol. 4, p. 215。

- [3] 景海峰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3—47页。
- [4] 参见阮炜,《文明的融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引起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8月号。
- [5] 撒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1998年,第75—101页。
- [6] 同上书,第75—78页。
- [7] 同上书,第84—85页。
- [8] 参见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读书》2001年第3期。